

北京口述历史

定宜庄 主编

个人叙述中的 同仁堂历史

定宜庄 张海燕 邢新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北京口述历史

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

定宜庄 张海燕 邢新欣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 / 定宜庄, 张海燕, 邢新欣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4. 10
(北京口述历史)
ISBN 978-7-200-10930-6

I. ①个… II. ①定… ②张… ③邢… III. ①同仁堂
药店—历史 IV. ①F7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795 号

北京口述历史
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
GEREN XUSHU ZHONG DE TONGREN TANG LISHI
定宜庄 张海燕 邢新欣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32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0930-6

定价: 5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主编的话

定立元

这套《北京口述历史》是由北京出版集团与我，以及几位年轻同人共同策划的。我们的宗旨，是希望用口述历史的方式，为北京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以及它所经历的这百余年的变迁，尽我们所能地，留下一些记录，哪怕只是些断片和残影。

北京作为一个数百年的“京城”，一个大国的首都，研究和介绍它的各种学术著作和其他出版物，乃至描述它的故事的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早已经是汗牛充栋。而我们这个口述系列与其他诸多作品的不同，就在于这是以北京人自己的口，来讲述的他们在这座城市所亲历的生活、感受，以及对祖先记忆的一套丛书。我们试图以这样一种具有学术规范的访谈方式，让北京人自己说话，自己来展现他们的性格与待人处事的特点，反之也通过他们，来深入具体地观察北京这个城市和它的历史。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是因为北京的文化，与其他任何“文化”一样，它的载体都是“人”。无论这种文化的历史多么悠久、多么辉煌灿烂，一旦承载着这种文化的“人”逝去，那些名胜古迹、琼楼玉宇、风味美食、时尚服饰，便都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而再无灵魂。而“人”的变化和消失，又远远比“物”更为迅速，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因“城市化”而使旧的一切都急剧消失的时刻。

如今是个“大家来做口述史”的时代，口述史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以口述的方式记录各种事件、各种人物的做法正在

遍地开花。但即便如此，像我们这套系列所提出的主题之厚重和想要完成的规模之宏大，在以往国内口述史中还不多见，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挑战，正是出于对北京城的感情和对抢救它的文化的急切，我们这套丛书的所有作者和编辑才会走到一起，才情愿以我们艰苦的努力和探索，来完成我们共同的心愿。至于这个尝试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读者的检验。

这套丛书既然做的是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就有必要先将何为“北京人”交代一下。

首先是时间的断限。如今北京居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清朝覆亡之后陆陆续续从全国各地涌入的，据1937年的人口统计，民国之初北京人口不足百万。民国四年（1915年）将京城四郊划入，人口增至120万。迄至1937年，北京人口为150万人左右。到1949年，常住人口达到420万。此后一直持续增长，到1990年就已经突破千万。到2009年，则已经突破了3000万。尽管这3000万人口毫无疑问地都是今天的北京人，但如果我们将这么庞大的人群都划在我们的口述访谈之内，范围就未免太大了。

本来，我们拟将寻访的“北京人”限定在1949年以前来京的420万人口之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发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个新旧政权交替、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开始创立并生长的时代，有着更为生动丰富的内容，并对北京的今天仍然产生着重大的、持续的影响，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也许比此前的某些内容更有意义。而亲身经历过这个时期并且能够述说的人，如果以当时18岁计算，到如今六十余年，也都已经80岁有余，也就是说，如果再不抓紧记录，不出几年，对这段历史的所有记忆也都会迅速消逝。所以，我们不得不将寻访的北京人的时间断限再延后五年左右，也就是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进入北京的人也包括在内，并将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也与老北京一样，作为我们进行访谈的重要目标之一。

其次，是北京所辖区域的界限。民国以来，北京的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复杂，总的趋势是城市不断扩大，四周的区县被不断划入城市之中。简要地说，民国十九年（1930年）北京被降为北平特别市，管辖区域包括内城六区、外城五区和东西南北四个郊区；1945年以后作出调整，为内城七区、外城五区和八个郊区。直到1949年，这种“内七、外五、郊八”的区级区划仍然保持着。1949年以后，北京的行政区划又经历了多次的大调整，其中变动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当年3月将河北省通县专区所属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等五县及通州市划入北京市。撤销通县和通州市，合并设立通州区；撤销良乡、房山二区，合并设立周口店区；撤销大兴县，改为大兴区；撤销南苑区，划归朝阳区、丰台区和大兴区；撤销顺义县，改为顺义区。同年10月又将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县划入北京市。到1958年底，北京市下辖13个市辖区、4个县。以后又经过撤区设县、撤县设区等反复调整，到2010年为止，北京共有14区2县，^①我们相信，北京市辖区的范围还在继续拓展中而远未停止。

我们决定将访谈的“北京人”范围扩展到郊区包括远郊区县，是出于这样几个考虑：

第一，清朝时的北京，是皇室与八旗官兵居住的重地，不仅驻扎在京郊与京师周边的八旗营房的官兵与京城内的旗人属于同一整体，是京师八旗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为皇室供应粮草和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八旗庄园，也都主要分布在京郊各地，他们被纳入专为皇室而设的机构——内务府的名册之内，其生活方式乃至心态，都与皇室、与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同于一般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所以，当我们将清代京师旗人的生活形态纳入我们的访谈重点时，也不得不将这些人包括

^① 北京具体的行政区划为：①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区、西城区（相当于过去的城区）；②城市功能拓展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相当于过去的近郊区）；③城市发展新区：通州区、顺义区、房山区、大兴区、昌平区；④生态涵养发展区：怀柔区、平谷区、门头沟区、密云县、延庆县。（③与④相当于过去的远郊区。）

在内。

再者，如今城市改建拆迁规模空前，人口流动异常活跃，大量世代居住于城内的老北京人已经迁居在郊区甚至远郊区的居民小区之中，城市与郊区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在 1949 年之后即已开始，尤其是城墙被拆除、大量郊区县被划入北京市之后。老北京胡同的生活既然已经成为越来越久远的记忆，我们对北京人生活的寻访，也无法仅仅局限于胡同之间。

当然，即使我们将口述访谈的时间和地域范围都予以扩大，还是尽量以 1949 年以前生活在四九城之内的北京人为重点。从时间上说，我们希望被访者年龄越大、记忆的年代越久远越好；而从地域上说，即使访谈的范围扩展到京郊，我们寻访的，主要也还是那些依赖京城为生、而非以务农为主的人们，我们想要展示的，主要还是城郊与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关系，因为这也是北京城的一个显著特征。

正如人们都知道的那样，虽然口述史目前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但作为一个学科，至少在中国还尚不成熟，有关它的理论、实践与整理等各方面的探索都还在进行之中，口述史究竟应该如何来做，也就没有一定之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套口述史系列强调的，是无论从题材和风格上都能够不拘一格，能够根据参与者的学科所长和特定条件，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尝试。譬如将口述史的访谈与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结合，或者以口述与史家所擅长的考证与检索文献相参照，等等。从题材上，可以是一个人的传记，也可以是一个人群、一个家族的记忆，还可以是一个店铺、一所学校的历史。总之，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为北京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开拓更多的研究视角与领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前 言

本书主题，是以不同人的口述，记述北京同仁堂的一段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如今 70 岁以上的老人，对上个世纪同仁堂的回忆。

近人陈宗蕃在《燕都丛考》中称：“大栅栏同仁堂药肆，相传数百年，贸易兴盛，肆主人乐氏寓新开路，栋宇联街，支族繁衍，北平商业以斯为最。”^① 同仁堂现在虽然发展成了一个海内外闻名的股份有限公司，却早已不姓乐了。

但北京 70 岁^②以上的老年人，却没有不知道同仁堂乐家的，有那么多人给我们讲过乐家的往事，或亲历，或传说，乐家的买卖早在清末民国时就已经成为老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而 20 世纪 50 年代公私合营时乐家的表现，以及“文革”时已经做到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的遭遇，不仅给予北京人深刻的印象，讲述之间中也产生了诸多版本。近年来，随着《风雨同仁堂》《乐家老铺》和《大宅门》等影视剧的热播，乐家的陈年旧事又被当作纯粹的传奇在年轻人中间流传。总之，同仁堂的发展历史、经营模式、用药制药的丰富经验，方方面面都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

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家喻户晓的中药店（现在已经是一个药业集团公司了），究竟还有多少可以挖掘的新意，恐怕是很多人都会提出的疑问。而我们还要坚持对这个药铺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叙述，其主要的创新

^① 陈宗蕃：《燕都丛考》第三编第二章，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486 页。

^② 这里的 70 岁，只是约略言之。自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迄今为 65 年，70 岁系指大约在此前出生的人。

之处有如下两点：

首先，虽然同仁堂的研究和宣传为数甚多，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空白和误区，其中的有些误区，甚至已经成为人们公认而很难改变的成见了。一般地说，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中，越是广为人知的宣传炒作热点，就越难以摆脱这种固定成见，同仁堂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其次，本书主要以个人叙事、亦即口述史的方式，来讲述同仁堂的历史。具体地说，即由众多不同身份的人物从各自不同的立场、角度，带着各自不同的记忆和感情，来讲述他所眼见和亲历的同仁堂故事，如果把每一位被访者的口述作为一个断片，众多的断片合在一起，看到的这个轮廓，显然要比一般的史书记载和研究更完整，更深刻，更生动和丰满。这是我们所做的一种新的尝试。

当然，作为史学的一个门类、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对于历史事实的反映，既有其他方法难以达到和深入之处，也有其不可避免的限制，我们用“轮廓”一词形容本书的效果也是要说明，它的面貌还有相对模糊的一面，这在本书中也有鲜明的反映。要想了解这个老字号的历史，仅仅读这样的口述史，是很费力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全面的。为弥补这一不足，在本书前面专列一篇文章，对同仁堂作一概要介绍，旨在帮助读者更容易进入本书诸篇口述的特定情境。但是，如果读者还要了解同仁堂从创立到发展的更多历史，以及它现在的辉煌成就，读我们这部口述史，很可能仍然找不到想要的内容。好在如今研究、介绍和宣传有关同仁堂的书籍已经出版不少，媒体对同仁堂的报导更是精彩纷呈，就不用我们在这里置喙了。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上篇，是乐家人的口述。其中有对祖上管理同仁堂的经验总结，但更着重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作为乐家后人特有的生活感受，而尤其是四大房中不同支系的后人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因为这正是百年来北京人经历的重大变革的缩影。

第二部分即下篇，是本书重点，是我们这部口述中最着力的部分。

我们要强调的是，同仁堂固然是一个由乐家创立的家族式企业，但同仁堂的历史，却不等同于乐家的家族史，这是目前有关同仁堂的研究和宣传中最大的误区。事实上，如同任何一个企业、商铺一样，同仁堂是一个由资本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构成的整体，其中的药工尤其不可忽视。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既有敬业精神又有各自独门绝活的、生产经验丰富的药工，以及他们对同仁堂的认同，才使同仁堂能够在北京百余家中药铺脱颖而出，也就是说，这是同仁堂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访谈的大多数老药工，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才进入同仁堂的，他们在这个药店的主要工作时间，都是在这个药店公私合营之后。他们并不仅仅是生产和技术的骨干，很多人还走上这个企业的领导岗位，他们见证了这个药店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他们丰富的制药、用药经验，他们作为主人翁所发挥的作用和对这个企业所做的贡献，都使资本家的叙述在本书中成为配角和陪衬。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对同仁堂的宣传中，他们却从始至终受到轻视，成为一个无声的群体。人们似乎一提同仁堂老店，就只知有乐家；如今当老药铺已经转而成为现代化大企业之后，这些老药工又因为已经“过时”而悄然隐没。这不仅对他们不公平，甚至对这个企业、对中药事业的发展，都是一种损害。本书以他们为主角，希望读者更多倾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不仅是对同仁堂历史的尊重，对同仁堂今天的发展，应该也会有某种启示。

第三部分只有一篇访谈，之所以称为“外一篇”，不仅因为它是后来才被补充进来的，而且因为本书叙述的主题是20世纪50年代及其之前，此篇口述所涉时间却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了。但这篇口述所展示出的内容和观念却很重要，说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也不为过。因为在这篇访谈中，被访者提出了某些尖锐的问题，而其中最核心、也是最令我们关心的，是对老药工这个群体的价值、贡献如何认识。这其实不仅关系到对同仁堂这个传统老药店的传统，也关系到对同

仁堂今天这个药业集团的整体评价，这是被访者本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总之，这篇访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至少，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倾听一下这个群体的人生经验和建议时，我们为老药工这个群体所做的口述史才反而凸显出必要的价值。

同仁堂早在1954年即公私合营，并在此后有了远较之前的乐家老药铺大得多的飞速发展。那么，以公私合营为界，此前的同仁堂与此后的同仁堂，尤其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作为药业集团的大企业，二者间究竟有没有、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传统老药铺的传统，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和继承，是我们如今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愿本书的问世，能使人们对同仁堂以及与它相似的传统行业，予以更多的兴趣和关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北京同仁堂药铺的经营模式：有关同仁堂的口述历史

定宜庄

一、有关同仁堂研究的空白和误区

同仁堂中药铺是北京久负盛名的老药铺。在如今的北京街道，“同仁堂”的招牌触目皆是，它所宣传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制药法规，也已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同仁堂在京城的老药铺中并非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与它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鹤年堂就开业于明代，延续时间比它更为长久，买卖也颇为兴隆。而同仁堂之所以能在京城当时的百余家中药铺中一枝独秀、脱颖而出，一般都认为与它自清雍正元年起就供奉御药房用药、成为承办官药的“皇差”直接相关，同仁堂自己显然也非常乐于强调和宣扬这点。但事实上，自清入民国再到 1949 年以前，同仁堂经历过数度起落，所有权也一度转入他人之手，^① 所谓“供奉御药”尽管是一块金字招牌，

^① 据载，同仁堂的官药承办人最初确是由乐家担任，但后来遭遇各种天灾人祸，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便将承办官药之事转交给乐姓的世交张世基，详见乾隆十八年（1753 年）乐礼之妻乐张氏的呈文：“身夫乐礼，原承先业开设同仁堂药铺，承办官药有年，缘身夫在日所欠官项债负颇多，以致铺务难支，具呈告退官药，蒙皇恩准著都院出示招商，并无承办之人……上年四月间忽被天灾，铺中尽毁，长子继亡，将家产入官归偿资生库。一门孤寡（尚有幼子以中）坐守待毙。复蒙天恩垂怜，将所焚铺基并堆房残货，仍赏身养活孤孀，复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官药客账私债准着十年后带销。”（乐松生：《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再如《清史资料》（一）曾载《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据文中说明，这些资料是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同志搜求的，包括了乾隆朝合同、议约等七件，嘉庆朝卖约、典字等五件，光绪朝售房字据一件，新中国成立后调查所得《万全堂国药店叙述资料》一件，共十四件。都很价值，可供参考（《清史资料》158 页）。万全堂为乐家祖上（第四世乐显扬的次子乐凤仪）开设的另一家中药铺，据乐松生的回忆：“在清初，我家开设同仁堂药铺的同时，或者更早些，还开设了万全堂药铺，这是现在崇文门外的万全堂药铺也称为乐家老铺的原因。创办同仁堂药铺的五世祖乐梧岗（名凤鸣）有兄弟四人，其中凤仪应当是开设万全堂药铺的人。因为在同仁堂文献中保存了一套在乾隆年间由凤仪之孙将万全堂出卖倒租与他姓的契约，在嘉庆年间又有凤仪的第四代折产分家卖绝的字据。”乐松生在这里提到的乐凤仪之孙，即指乐毓麟、乐毓秀和他们的侄子乐开基（《清史资料》159 页）。这里特别提到此事的原因是说明，许多人和事的发展，都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从一条线简单地发展过来的，其间往往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多条支线交替变换的过程，有的时候，与开始时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

但对这个药铺日后的发展究竟起到几分作用，乃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

与此类似的空白和误区，在有关同仁堂的研究中远不止此，我们还可以再举几例：

其一，将同仁堂视为一个传统的中药铺，忽略了民国以来百余年、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个“老字号”致力于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经验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民国时期新与旧、西与中相互碰撞、交击同时也并存、交融的特殊时代的缩影。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这种转型不仅仅发生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同时也发生在被人们视为“土气”“守旧”典型的北平，同仁堂的发展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其二，同仁堂固然是一个由乐家创立的家族式企业，但同仁堂的历史，却不等同于乐家的家族史，这是目前有关同仁堂的研究和宣传中最大的误区。事实上，如同任何一个企业、商铺一样，同仁堂是一个由资本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构成的整体，其中的药工尤其不可忽视。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既有敬业精神又有各自独门绝活的、生产经验丰富的药工，以及他们对同仁堂的认同，才使同仁堂能够在北京百余家中药铺中脱颖而出，这是同仁堂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其三，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据《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据载，老大房一支开设药铺的时间是民国十年（1921年），乐家诸房这种独特的经营模式的形成即自此始。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

香港等地，实际数字当不止此。^① 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强的实力。

1954年公私合营以后，北京的同仁堂仅余本店一座（天津达仁堂仍然保留），其他各房开设的药铺均被以各种名目改归其他名号而基本消失。即使唯一保留的同仁堂本店，被关注的也仅仅是乐松生和他所在的房支。这种只知其一不计其他、只关注中心的一点而不及全面的做法，是有助于了解乐家和他们创立的这个同仁堂药铺的。

其四，同仁堂是北京市最早公私合营的企业，乐松生因此而成为“红色资本家”的代表，同仁堂何以能够成为资本家中的“楷模”，资本家的对立方即工人一方对此持何种看法，也是很少有人涉足到的空白。

种种空白和误解的出现，固然都事出有因，但仅仅依据档案和官方文献的记载，对这些问题难以进行具体深入的探究。为此，我们尝试采用不同的途径，其中尤其借助了口述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在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同仁堂的发展过程和经验，以及劳资双方各自的命运。

目前出版的介绍同仁堂的作品已经不少，其中当然亦不乏佳作，而我们这部口述史，不同于其他著作的特点有二：

首先，我们特别地将访谈重点，放在老药工这一群体上。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能否吸引这样一批人才，是同仁堂也是其他任何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二是在所有有关同仁堂的出版物和影视媒体中，他们一直

^① 关于乐家子孙在各地开设分号的情况，有关报道的说法与乐曙青先生所说基本一致：“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共同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民国十年（1921年），乐孟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仁堂’药店。随后，乐仲繁支开了乐家老铺‘宏济堂’药店，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据统计：“前后总计，乐孟繁支开设了南京同仁堂一个，宏济堂三个，乐仁堂五个，宏仁堂四个；乐仲繁支开设了颐龄堂一个，永仁堂三个，怀仁堂一个，沛仁堂一个；乐叔繁支开设了济仁堂两个，乐舜记一个，宏德堂一个；乐季繁支开设了达仁堂十个，树仁堂一个。这三十多号‘乐家老铺’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见《北京同仁堂史》，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是隐而不见的、沉默的一群，而口述史的最大意义，正是能够赋予这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以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性，并从而使他们那些极其丰富的治药经验、对同仁堂管理的体会和评价等，有了进入这个企业历史的机会。

其次，虽然我们的采访对象以同仁堂药工为主，但也尽其可能地照顾到各个相关方面，尤其是同仁堂乐家的后人（本书将其称之为“资方”，因为迄今为止药工们仍然习惯称他们为“资本家”）。也就是说，本书是由老药工、资方两部分构成的，每一部分都以口述为主，同时参之以文字记录，因此，将口述与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互证互补，便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特色。

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涉及的时间，基本上是 20 世纪以后，至于同仁堂在清朝时的发展与兴衰史，恕不赘叙。

二、本书资料来源介绍

下面将本书的口述与文献来源作一简要介绍：

（一）资方资料来源

我们将资方访谈放在第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对于同仁堂的情况，包括乐家四大房的族谱脉络、各房支集体构筑的整个药业网络、同仁堂作为企业的经营特点，以及乐家子孙的生活方式、选择的不同政治道路等等，都有着比较概括的叙述，有助于读者找到进入这个题目的门径，也为后面老药工口述的内容，作一个必要的铺垫。

1. 乐笃周手稿：《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这部手稿是乐笃周在 30 余年前亦即 1977 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泉水先生之约所撰的文章，迄今为止未曾公开发表过，见过的人也不多。我是在 2009 年采访贾怀增先生时，从他手里得到的。据作者自称，这篇文稿中凡 1926 年以前的历史，得自前辈故老的讲述，1926 年后，全系个人经历。态度是颇为谨慎认真的。该文涉及的内容

包括：

- (1) 帝国主义、同业资本家和同仁堂的关系；
- (2) 同仁堂家店不分和职工分零钱简述；
- (3) 学习改造后的思想情况。

据乐笃周在文中称：

因为手头既无《同仁堂药目》《乐氏家谱》等材料，也无其他参考资料。加之年老，记忆力衰退，执笔更困难，只能就想到的，口述由别人帮助记录、整理、抄写。因为是根据个人的亲闻和亲历回忆而写出来的，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只能说是“我所知道的同仁堂”。

写于那个尚未摆脱“文革”影响、仍然心存余悸的特定年代，不断批判自己，摆脱不了那些套路和套话在所难免，尤其是第三节，但这份文献仍不失为一份非常宝贵的资料。它的意义在于，这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份曾直接参与同仁堂管理，并从这个角度较为系统地总结同仁堂经验的文件。

乐笃周（1894—1979年）字叶潜，乐小庭第三子。同仁堂的中兴人物为乐平泉（号印川），乐平泉生有四子，即后来的四大房，其中长子名乐孟繁，乐孟繁有两子，即乐小庭和乐均士。乐小庭也有四子，即乐佑申、乐西园、乐笃周和乐益卿。

乐笃周早年留学法国，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民国二十年（1931年）在北京创办宏仁堂国药号，后又在上海、青岛、天津等地开设分号。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南京市第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在乐家四大房的诸多子孙中，乐笃周受到的争议最多。但据他的侄子乐曙青口述，他是同仁堂众子弟中最值得一写的人物：“他在欧洲美洲的转了一个弯儿，回来以后就开了眼界了，他自己上祁州药市采购去，他认为要弄中药，就应该把中药弄成托拉斯，可是他这一个愿望始终没实现。”乐笃周最受该家族子弟诟病的一件事，就是在南京开设同

仁堂，据乐松生称：“民国十七八年（1928—1929年）政治中心南移，乐佑申就要他的亲弟弟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是违反族规的，于是群起而攻之。”^①

但是无论如何争议，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

2. 乐侠口述

乐侠是二房乐仲繁的第四代曾孙，其父为乐元可。乐仲繁生三子，次子乐咏西有四个儿子，乐元可是长子。据说这房中最活跃的，就是乐咏西这两个儿子，即乐元可和乐孝先。乐元可曾与三代内务府大臣增崇的侄子，以及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等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所谓八大少，无非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而已。20世纪40年代，乐元可的家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地点，据称他夫妻为地下党保存经费。在物价一日三涨之期，他们常易款为药材或黄金以免党的经费过分贬值。故而这对贤伉俪被地下党誉为“金库主任”。20世纪50年代这段故事曾被拍成电影《地下金库》。1949年以前，二房中参加共产党的似较其他各房更多。不过在乐侠的口述中，还是讲述了很多他的父亲参与同仁堂制药和管理的经历和经验。

3. 乐曙青口述

乐曙青是老大房乐孟繁的第四代。父亲乐益卿，20世纪50年代曾与乐松生一道作为资方管理同仁堂，任同仁堂药店副经理。乐曙青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并未直接参与任何同仁堂的事务，但对四大房各房支的情况还是颇为熟悉。他讲述的内容主要有二：一是同仁堂作为各房子孙供奉的“大公中”，各房自行开设的药铺为“小公中”的经营方式；一是各房子孙的生活方式。尤以后者为更有趣。

4. 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

包括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第四房乐季繁次子乐达义曾因三房

^① 载《北京文史资料》第11辑，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